

怕妻子分财产 老板与朋友导演杀妻案

2006年8月28日下午5时许,随着热辣辣的太阳逐渐西去,一名女清洁工到上海市南汇区一处海边的芦苇丛中清理垃圾,突然发现了一具已经腐败的女尸。随后赶来的警察经过3天的调查,最后将怀疑的重点放在了死者丈夫黄建东的身上。在警察的讯问下,黄建东最终交代了雇凶杀人的犯罪事实。

妻子离家出走

现年60岁的黄建东是上海南汇区人。1990年前后,黄建东与前妻离了婚。1995年年底,黄建东和也曾经离过婚的白玉虹重新组建了家庭。

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黄建东和白玉虹对这份婚姻都很在乎。在结婚后不久,黄建东将自己积蓄下来的150万元分成两半,一半给白玉虹,另一半留在自己身边。1998年底,在白玉虹的鼓励下,黄建东成立了一家钢材加工厂。黄建东管理工厂的运作,白玉虹负责财务管理。虽然刚开始工厂经营得不太顺利,但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钢材厂的生意逐渐好了起来。

因忙于经营公司,黄建东陪伴白玉虹的时间相对少了许多,这让白玉虹心中很落寞。为了逃避回到家中的空虚感,白玉虹慢慢开始晚回家。

白玉虹的晚归,让黄建东很生气。黄建东还发现,白玉虹开始注重起打扮了。晚归、爱打扮,黄建东很自然认为白玉虹在外面有了“相好”。但他并没有证据。夫妻双方之间一旦失去了信任,争吵便在所难免。到后来,白玉虹反过来怀疑黄建东在外面有了情妇。

在双方感情出现危机的同时,黄建东发现自己经营的钢材厂财务也有问题。“每个月钱都被她拿掉了,我感觉到很气愤。”黄建东说。

2006年4月,白玉虹拿上自己的衣物,离开了黄建东,住到了女儿家里。

挽救婚姻终无果

“你回来吧,只要你回到我的身边,我一定会好好地对待你。”在等不到妻子回来后,黄建东只好当面向她求情。可此时的白玉虹对与黄建东之间的感情已经充满了绝望。过了一个星期后,黄建东再次找到妻子,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可白玉虹态度很坚决:“咱们没有必要再呆在一起了,我们离婚吧!”

妻子提出离婚,这让黄建东感觉到无法接受。后黄建东咨询了一下律师,如果白玉虹要与他离婚的话,他所创办的公司以及存款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也就是说,自己的另一半财产都要分给白玉虹。

离婚不但失去了温暖的家庭,还面临着财产的分割,而这还等于是她将自己用了,让自己在朋友面前面子上很不过去。

黄建东决定挽救这场婚姻。黄建东找过亲戚和朋友,让他们劝解白玉虹,但最终没有结果。他还找过白玉虹的女儿,希望她能劝解一下母亲,但白玉虹同样不买账。

2006年7月初,黄建东只好亲自去找白玉虹。看到黄建东不同意离婚,白玉虹感觉该是和他谈条件的时候。“你先将你名下的一套房子过户给我女儿,我才能回家。”白玉虹提出的条件,是黄建东万万没有想到的。自己不想离婚,就是怕白玉虹分割自己的房子和钱款。白玉虹提出将房子过户到她和前夫所生女儿的名下,这不等于要将房子白白送给她吗?“我不可能将房子过户到你女儿的名下,你这是妄想。”黄建东盯着妻子冷冷地说。“既然你不同意将房子过户到我女儿名下,那我们

只有离婚。”白玉虹也不甘示弱,“你不将房子过户,说明你不信任我们母女俩,我怎么可能与你呆在一起呢?”

本想挽回婚姻,没想到妻子将房子进行过户作为回家的条件。黄建东越想越气:“她只是要我的钱,不是要我的人。”自己已经是花甲之人,没想到要被一个女人抛弃了。“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不是好惹的。”黄建东心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教训她一下。”

面对朋友图报恩

找谁帮忙呢?黄建东突然想起一个名叫程云波的人。比黄建东小5岁的程云波与黄建东一样,也是一个个体老板。黄建东之所以找程云波,是因为以前曾经帮助过他。

那是12年前的一天,程云波开着摩托车到驾校去学驾驶。在路边的一个转弯处,因来不及拐弯,程云波和摩托车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随后昏迷过去。后来,几个围观的路人从程云波身上掏出一份通讯录,按照通讯录上的名单,一一打了电话,希望他们赶紧过来救助程云波。

让程云波没有想到,过了半个小时,只有交往一般的黄建东赶到了现场。随后,黄建东又将程云波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在整个治疗当中,黄建东像对待亲人一样,替程云波缴纳了所有的费用。等程云波康复出院后,他找到黄建东,问他为自己垫付了多少医药费。黄建东笑着说:“还钱的事情不用提了,是朋友就别将钱看得太重。”当时,程云波还有些落魄,他激动地说:“大哥你今天有恩于我,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一定要尽力的。”

黄建东找到程云波后,黄建东对程云波说:“你一定要

帮助我教训一个人。”这回黄建东直接说明是帮助自己教训人。程云波问要教训的是谁,黄建东说等必要时再告诉你。

为了完成恩人黄建东的嘱托,程云波特意去了一趟上海市区。在漕宝路虹梅路口,程云波找到了一个名叫黄锋的河南籍年轻人。程云波对黄锋说,他朋友想“教训”一个人,只要不出人命就行。黄锋听了后说:“我对帮别人打架不敢兴趣,打了别人会有麻烦,‘处理’掉反而好一些。”

程云波一听“处理”这两个字,便陡然感到一阵紧张,但还是试探地问黄锋“处理”一个人需要多少钱?黄锋说最少需要12万元。

走上罪恶之路

当程云波从市区回到南汇后,为了急于获悉是否找到人,黄建东来到了程云波的家。“钱不是问题,我马上准备好。”黄建东向程云波保证。

程云波和黄锋再次在上海市区碰了面。为了急于做成这笔“买卖”,黄锋开始自我吹嘘:“我有反侦查能力,做事情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程云波听了后说:“你要的钱数我们答应。”随后,黄锋让程云波提供有关被“摆平”的相关信息。这次程云波和黄锋将碰面的地点约在了南汇的某处碰头。在分开时,黄锋告诉程云波,动手前先付两万定金,等事情办妥后再给剩下的10万元。

程云波回到南汇将黄锋的要求告诉黄建东后,黄建东马上答应。随后,黄建东将一个密封好的牛皮纸信封和11万元现金给了程云波。黄建东告诉程云波,两万元定金和有关被摆平人的照片和详细住址都在信封里面。黄建东对程云波说:“11万元现金中,其中

的1万元是给你的辛苦费。”

为怕日后万一留下什么蛛丝马迹,黄建东先买了一部手机和号码,并让程云波也买了一个手机和号码,专供他们两人之间联系使用。

程云波在预定地点,将“信封”交给黄锋。黄锋以为程云波已经知道被摆平人的情况,当着他的面打开了信封。当程云波看到信封里面的照片后,惊讶得有点说不出话来。这照片不是别人,正是黄建东的妻子白玉虹!

和黄锋分手后,程云波也曾经陷入痛苦的挣扎当中。该不该将白玉虹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告诉她呢?因为白玉虹也曾经对自己有恩啊。那是在10年前,程云波因一时手头紧张,到黄建东的公司借钱,当时恰巧黄建东到外地出差去了。但白玉虹听了程云波的来意后,大方地说:“我以为是什么事情呢,谁能没有困难。”说完,将5000元给了程云波。没想到白玉虹如此热心大方,程云波连声说着感激的话语,白玉虹随后说:“这点钱就算我借给你的,你就拿去用吧。”程云波后来只还了2000元给白玉虹,因再没有和白玉虹见过面,余下的钱也就没有还给她。

夫妻俩都曾经有恩于自己。在报恩的抉择中,程云波最终选择了一条罪恶之路。

顶替“上岗”酿血案

2006年8月初,黄锋一直在白玉虹所住的小区门口蹲守了两天,可每次白玉虹都是自己开车出来,而且车上还坐着其他人,根本没有机会下手。过了几天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黄锋找不到他,带着两万元定金,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黄锋失踪了,自己如何向黄建东交代呢?如果告诉黄建东

东说黄锋拿着两万元失踪了,一则黄建东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再说即使黄建东相信,自己以后肯定和黄建东做不成朋友了。程云波更担心,如果自己告诉黄建东说黄锋拿两万元跑了,黄建东肯定怀疑黄锋将杀白玉虹的事告诉自己。黄建东本来就不想让自己知道所杀的人是他妻子,一旦他起了疑心,会找人对自己下手吗?想来想去,忽然,一个罪恶的念头在程云波的心头闪现:如果我自己动手杀死白玉虹,不但好向黄建东交代,那钱就全归我了。

2006年8月22日下午,程云波在白玉虹所住的小区门口等候。看到白玉虹出来,程云波猜想白玉虹可能去菜场,他快步先到了菜场门口。果然,白玉虹向菜场走来,程云波假装亲热地上前和白玉虹打招呼,好几年没见,白玉虹对程云波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我和你老公是好朋友,你还曾经借钱给我过。”程云波这么一说,白玉虹马上想起了。“不用还,这点钱你怎么还放在心上。”聊着聊着两人约定,第二天一起到海边去玩。

8月23日下午4点多。“咱们到海边去散散步。”程云波开着白玉虹到了海边,一阵海风吹来,程云波脑子好像被吹清醒了,他决定放弃杀害白玉虹,毕竟她对自己有恩。就在程云波重新发动汽车准备带白玉虹离开海边时,白玉虹看到海边有一片芦苇丛,就说想进去小便。当白玉虹向芦苇丛中走去的时候,程云波看到海边的芦苇丛很偏僻,突然心想杀了白玉虹不会有人知道。在看到四周无人后,程云波跟着白玉虹走了进去。“我跟她过去,她一点也没有介意。”程云波说。趁白玉虹不备,程云波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短钢筋,向白玉虹头部猛砸了过去……

最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黄建东和程云波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贪官攀上假冒中组部处长被骗巨款

按照“游戏规则”,只有包工头贿赂县官,哪有县官去贿赂包工头的?这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当然,前提是县官想找靠山,包工头又是“中组部处长”。2006年7月5日,被称为“四川第一贪”的四川省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因受贿1859万余元和133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在案件审理期间,田玉飞交代曾向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行贿47万元。田玉飞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高度重视。但是经调查证实,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处长杜太平。北京公安局随即立案,并很快将假冒中组部处长的包工头杜太平抓获。

2007年9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招摇撞骗罪终审判决杜太平有期徒刑6年。

寻找靠山 包工头自封“中组部处长”

49岁的杜太平是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普通农民。1988年,杜太平组建了一个小建筑施工队来到北京发展。

杜太平发现,在京城要想混下去,没有靠山是不行的,名头越大越能唬住人。曾有不少次,杜太平出去拉工程时,不少单位见他的建筑队不过是一个从小县城来的,纷纷不屑一顾地回绝了他。

有一次,杜太平和另一个包工头争夺一个项目,杜太平自恃自己的建筑队各方面条件

都比对方强,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对手承包了这个工程。不服的杜太平质问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把工程给了他?”

负责人一席话差点气死杜太平:“人家是一个正规的工程队,由某部委主管,交给他,我们放心。”而杜太平知道,那家工程队不过是挂靠在某部委旗下而已,和某部委没有直接关系。

吃一堑长一智,杜太平开始到处托关系,想找一家挂靠单位。1999年杜太平通过关系终于将建筑队挂靠在了“中华爱国主义研究会”下属的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北京特明达科贸公司是某部委的三产,这一次杜太平“麻雀变凤凰”,名片上印着“北京特明达建筑公司总经理(正处级)”。杜太平得意地到处发放自己的名片,老乡们接到他的名片后,都说:“你小子混得不错啊,都成处级干部了啊!别忘了照顾兄弟们啊!”

杜太平洋洋自得地说:“这算什么啊。告诉你们吧,现在有人要推荐我到中组部的一家单位去工作。到时候我到了中组部,你们想办什么事包在我身上!”从此,在北京的四川人中,有不少人都知道了有个中组部的“杜处长”是四川老乡,纷纷托人来认识这位“杜处长”,请他出席各种饭局。

杜太平也知道自己这个“处级干部”经不起推敲,为了不露出破绽,每次别人请他吃饭时,他都要先问清楚有什么

人参加,如果得知有在国家机关任职的人参加时,他就借口不去。去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只留手机号码,绝不发名片。

画家牵线

真贪官攀上假处长

渐渐地,杜太平在“中组部处长”这一角色的扮演中越来越自如,他还利用这顶“帽子”骗了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背着远在四川老家的妻子和女孩同居了。而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直到案发才知道,这个与自己同床共枕的老头根本不是什么“中组部处长”,而是一个地地道的农民包工头,而且已经娶妻生有三个子女。

2000年,一位刘画家认识了杜太平“处长”,并辗转介绍给四川籍的画家余先生。在一场比赛上,刘画家隆重介绍杜太平:“这位是中组部的处长,咱们四川老乡。”当大家问杜太平在哪个部门时,杜太平搪塞道:“现在部里正在进行人事调整,具体的部门还没有定下来,不过快了。”

在京城打拼多年的余画家是一个“老江湖”,他对新认识的“杜处长”有点不放心。余画家向其他老乡打听时,有人告诉他杜太平确实是中组部的处长,余画家这才放了心。正是朋友间的口口相传使杜太平的身份得到了“铁证”。

而远在四川省犍为县的县委书记田玉飞认识杜太平的介绍人正是余画家。余画家结识了杜太平后,向家人炫耀自己在北京广交权贵名流,其

中就有中组部处长杜太平。而余画家的侄子知道后,便告诉田玉飞,余画家结识了一名中组部处长。

此时的田玉飞正在疯狂敛财。田玉飞收受了巨额贿赂后,担心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在他看来,要加大不被严惩的保险系数,就是继续升迁,并且“上头”要有人庇护。

田玉飞四处托关系想结识“上面的人”,当听说余画家在北京认识了一个“中组部处长”,而且还是四川人时,他认为这真是喜从天降。田玉飞决定要牢牢抓住这个“中组部处长”来为自己的乌纱帽加重砝码。

田玉飞马上联系到余画家,向他询问了杜太平的情况,余画家将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田玉飞。随后,田玉飞马上致电杜太平。杜太平一听是个地方领导,没想到自己的名号都已经传到四川了,也就打着哈哈说:“好,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

进京“拜佛”

47万元只是见面礼

2003年3月份,余画家在一次饭局中发现,同桌的人开始称杜太平为“局长”,并都说他已高升,杜太平也没有否认。于是这一信息很快被余画家传递回四川。

田玉飞听说“杜处长”已经升为“杜局长”后,再次拨通电话:“恭喜杜局长高升,杜局长真是前途无量啊。局长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来看看?”

杜太平依然推托道:“最近要到内蒙古等地区考察干部,实在抽不出时间。”杜太平从田玉飞如此殷勤的态度上推断这个人肯定有求于“中组部处长”,他决定放长线钓大鱼,看看这个田玉飞究竟要做什么。

两次邀请被拒,心急如焚的田玉飞决定赴京“拜佛”。

2003年9月20日,田玉飞给杜太平打电话说自己明天就坐飞机到北京,有机会和他见上一面。杜太平为田玉飞在保利大厦订了一间客房,又通过朋友找了辆挂军牌的桑塔纳和一名司机。2003年9月21日,田玉飞飞抵北京。精心打扮了一番的杜太平看上去颇有国家干部的派头。他坐着军车,亲自去机场接田玉飞。

田玉飞与杜太平之间这惟一的一次见面时间并不长。杜太平从机场将田玉飞接到保利大厦,两人吃了顿饭,休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就回到房间。田玉飞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杜太平,信封内有张银行卡,说:“杜局长,听说你的女儿要出国了,这50万(实为47万余元)是我的一点心意,算是资助局长干金的学费。”

杜太平盘算着: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

黑色幽默

在官场江湖中上演

2004年底,四川省乐山市换届选举,田玉飞成为副市长的热门人选。此时,省委考察组先后收到大量关于田玉

飞的举报材料,田玉飞被双规后,为了获得减刑的立功机会,很快将“中央组织部处长、局长杜太平”吐了出来。田玉飞的举报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迅速报告给中组部、中纪委。

中组部接到这样的消息后,自然十分重视,可是查来查去,中组部根本就没有杜太平这个人。随后,中组部将此情况通报给公安部,公安部刑侦局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随即全面介入侦破此案。

田玉飞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相信杜太平的身份呢?在审理中,杜太平说出了自己对此的看法:“田玉飞认为我是中组部的处长,肯定是想利用关系,以后好给他办事。”

至于两名画家将他引见给其他朋友,杜太平也认为他们各有目的:刘画家把他介绍给别人并说是中组部的处长,是希望别人看在中组部处长的面子上,就会多买的画。余画家将他称为中组部处长、局长,是因为余画家为了笼络田玉飞,提高他在田玉飞眼中的地位。

作为县委书记的田玉飞,智力不可能低下到错把包工头当处长,正是怕被查处、急于升迁的焦躁心理,使田玉飞变成了生性错过“天赐良机”的低能儿。与大多贪污犯罪者一样,田玉飞害怕东窗事发,能够预防的惟一途径就是“朝里有人”。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去追究真假?其实答案很显然,因为串联起“谎言链条”的全是熟人。因为没有人怀疑熟人。

据《法制日报》